

#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 ——基于涉华负面新闻角度

孟丽君<sup>1</sup> 李 钢<sup>2</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8; 2.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中美关系一直是两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媒体情绪会反映出美国政府、社会和人民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立场。基于 1990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数据以及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冲击(TDS)在美国发生的 2 到 3 个月后,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指数值急剧上升,并在第三个月时达到最高值,随后开始逐渐下降。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飙升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中美双边贸易波动的内生因素。

**【关键词】**中美贸易顺差 涉华负面新闻 中美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25(2019)03-0063-08

## 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 Comtrade),1993 年中国对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顺差,顺差额为 62.85 亿美元。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中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到 2017 年中美贸易顺差已经扩大到 2758.86 亿美元。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逐渐成为两国贸易发展的不和谐音符,中国不断遭到来自美国的批评和质疑。通常,伴随着意外变化的中美贸易顺差,美国境内常常出现的涉华负面新闻主要包括:环境污染、安全标准、知识产权、倾销等等(庄子银,2018;

卢锋等,2017)。此外,与中美贸易顺差常常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负面消息,往往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西藏、童工等有关(朱锋,2000),且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同样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正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商业社会对中美两国贸易失衡不满的逐渐累积,才导致中美贸易争端频频出现、贸易摩擦加剧(Ramirez & Rong, 2012)。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执政,中美贸易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更多冲突,在美国境内会出现更多涉华负面新闻。

**【收稿日期】**2018-12-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动态视角下我国内需变动影响出口的机制及政策应对研究”(编号:715732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孟丽君(1989.9-),女,汉,内蒙古呼和浩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李钢(1973.11-),男,汉,贵州思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

许多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学者都曾怀疑过涉华负面新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顺差的反应(Ramirez,2012)。但目前研究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关文献非常少,中国学者大多采用案例分析法进行分析,而基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鉴于近几年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阐明的重要问题。因此,笔者试图探索涉华负面新闻,包括与中国贸易直接相关的负面新闻(如知识产权、操纵汇率等),与中国贸易不直接相关的负面新闻(如关于中国的人权、西藏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周期性中美贸易顺差驱动的呢?

##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外媒涉华报道热度长期保持在高位,负面新闻占比较大,究其原因何在?国外多方学者的研究认为这可能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有关。一些学者从中国出口贸易角度出发,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会对进口国社会产生各种不利影响。Acemoglu(阿西莫格鲁,2016)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扩大的出口贸易总量,是导致美国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降低本地劳动力工资(主要指进口竞争制造业的工资)的主要原因。Autor等人(奥托尔,2016)从社会福利角度分析,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冲击不仅会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以及其他转移福利的增加,而且还会引发当地制造业以外行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下降。

Groseclose & Milyo(格罗斯克洛斯和米洛,2005)基于智库计数的方法研究,认为中国出口量与进口国内涉华新闻之间具有一定联系,但他们的指数只计算了少量出口,并不能充分说明美国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必然联系。Pierce & Schott(皮尔斯和斯科特,2016)研究发现中国出口量与进口国境内媒体所报道的涉华新闻数量呈现正相关,即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越多,该地区关于中国的新闻覆盖率就越大。另一些学者从贸易顺差角度考虑,认为长期的两国间贸易不平衡才是引发国外有关涉华负面新闻增加的主要原因。Carlos D(卡洛斯,2012)研究得出,美国商业社会对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不满逐渐累积,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根源,致使两国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更多冲突,在美国境内出现更多涉华负面新闻。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顺差变化与美国涉华负面新闻的报道之间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美国媒体报道的有关涉华负面新闻,会导致受众对中国有更多的负面看法。

## 三、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中主要包含两个关键的变量: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中美贸易顺差冲击(TDS)。

### (一) 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为了构建涉华负面新闻指数,利用道琼斯新闻数据库(Factiva)来检索美国境内每月发布的涉华负面新闻文章总量。道琼斯新闻数据库(Factiva)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诸如:《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道琼斯(Dow Jones)和路透通讯社(Reuters Newswires)以及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等媒体的新闻信息,它是目前最全面的一个电子新闻数据来源。

Factiva中的“搜索建设”功能能够进行更精细的搜索,通过添加关键词,能够集中关注美国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但这些新闻必须包含一些美国对中国典型不满的关键词。在文中,美国对中国典型不满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与中国贸易相关的负面新闻,如“汇率操纵”“环境污染”“安全标准”“知识产权”“倾销”等;第二类,与中国贸易间接相关的负面新闻,如“人权”“西藏”“童工”“民主”等等。选择这些词语作为关键词的原因在于:第一,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词在严格意义上可以单独当作一个“新闻”来看;第二,但若文章中包含了上述关键词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时,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不利的。虽然这些关键词本身可能缺乏新闻价值,但是与其相关的新闻报道就会具有一定新闻价值。例如,美国新闻报道中包含关键词为“人权”的中国新闻,那些谈论中国人权的文章显然不是仅仅为了揭露什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诋毁中国。

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包含一个或多个关键词的新闻总数,与所有主题为中国的新闻文章总数所求出的比值。其中包含关键词的新闻文章总数为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分子,而主题为中国的新闻文章总数为新闻指数的分母。新闻指数间的时间间隔为月,所以这也是个月度时间序列。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bni = \frac{\sum_{i=1}^{30} news\_neg}{\sum_{i=1}^{30} news} \quad (1)$$

其中,  $bni$  为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美国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 $bni_{us}$ ) 和澳大利亚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 $bni_{au}$ ) 的计算方法与上面一致;  $news_{neg}$  表示的是包含以上关键词的涉华负面新闻文章数量, 而  $news$  则表示涉华新闻总量, 既包括负面新闻业, 也包括正面新闻文章总数;  $i$  代表的是天数, 按照每个月 30 天来计算该指数值。

时间序列需要确保其平稳性, 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可能会导致该指数失去对实验的可预测性。如果负面新闻指数完全由随时间而来的外生事件构成, 那么该指数就可能存在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的模型显示, 如果指数是这样的组合, 那么该序列应该遵循随机漫步 (吴浩等, 2016)。为了测试该索引是否不可预测, 在本序列中执行了单位根的 DF 和 ADF 检验。如表 1 Panel A 给出的测试结果表明, 无论是包含趋势项还是滞后期, 该序列都清楚地遵循了一个平稳的过程: 测试统计量总是远远低于 1% 的临界值。

表 1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是否有趋势项和滞后	Test Statistic	1% Critical Value	5% Critical Value	10% Critical Value
Panel A					
负面新闻指数 ( $bni_{us}$ )	无	-7.033	-3.453	-2.877	-2.570
	趋势项	-8.416	-3.987	-3.427	-3.130
	趋势项和滞后 1 期	-5.844	-3.453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2 期	-4.889	-3.453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3 期	-3.870	-3.453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4 期	-3.331	-3.454	-2.877	-2.570
Panel B					
贸易顺差冲击 (TDS)	无	-18.577	-3.453	-2.877	-2.570
	趋势项	-18.570	-3.987	-3.427	-3.130
	趋势项和滞后 1 期	-13.644	-3.454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2 期	-12.506	-3.454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3 期	-11.326	-3.454	-2.877	-2.570
	趋势项和滞后 4 期	-11.804	-3.454	-2.877	-2.570

数据来源于: stata 计算得出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 美国定期将最惠国 (MFN) 的地位扩展到中国, 但在每次延期不久之前, 美国国会就会在续约问题上进行辩论时, 出现一个或多个引起媒体注意的负面关键词 (谭融, 2004)。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 关于中国负面新闻的指数

值明显大幅降低了, 这也说明中美双边贸易有助于促进两国的良好关系 (屠新泉, 2007)。

此后, 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一度在美国境内保持沉寂, 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有关中国的负面议题在美国境内卷土重来, 涉华负面新闻指数再次上升。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的经济事务逐渐取代了反恐议题, 再次回到公众和政治人物关注的首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两党在选举中大打经济牌, 以振兴产业、拉抬就业为选民注射“强心剂”。当对经济颓势毫无良方、甚至回天乏术时, 美国两党就会不约而同地转向负面指责与推卸责任, 中国就成了“替罪羊”。此外,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美国害怕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后会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阻碍其建立单极世界体系, 所以对中国的关注不断增强, 对中国不满也越来越多, 成见也就逐渐加深 (吴心伯, 2017)。近年来, 涉华负面新闻的数量又再次迅速上升, 尤其是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 各方政治候选人竞相运用新媒体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假想敌”进行攻击, 该类负面舆论总能成为竞选者彰显“强硬”的靶子, 以达到煽动目标选民支持的目的 (Arcuri & Luciano, 2008; Che 等人, 2016)。因此, 近年涉华负面新闻指数又迅速上升。

## (二) 中美贸易顺差冲击

中美贸易顺差冲击 (TDS) 是指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的意外变化, 即由中美贸易顺差发生改变时所带来的额外效应。关于美国从中国进口和向中国出口的月度数据, 均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对外贸易统计栏目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为了推断这个序列, 使用了一个贸易顺差变化模型 (Enders, Walter, 1995; 冯文权, 1989)。即选用一般线性预测 AR 模型, 由已知的  $N$  个数据, 推导出第  $N$  点前面或后面的数据。然而, 因为级数在水平上是不稳定的, 根据所考虑的 3 个标准: 赤池信息准则 (AIC)、贝叶

斯信息准则(BIC)和汉南-奎因信息准则(Hannan-Quinn),最终选择滞后两阶的最优动态模型。因此,在控制了季节性效应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的变化遵循了一个二阶自回归过程:

$$(2)$$

其中,  $\beta_1 \Delta td_{t-1}$  代表从  $t-1$  期到  $t$  期的贸易顺差的变化;在此回归中  $\beta_1$  和  $\beta_2$  系数是自回归参数;使用月度虚拟变量来控制季节性影响。中美贸易顺差的变化不是由方程式(2)所解释的,而是方程以外的变化,即中美贸易顺差冲击。

表 2 给出了公式(2)的估计结果,自回归滞后一阶和二阶的参数总和约为-0.60,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的变化是均值回归。月度虚拟变量的许多系数都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这个序列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因素。

表 2 贸易顺差冲击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LD. td	-0.435***	(-7.91)
L2D. td	-0.162***	(-2.97)
2月	-0.126***	(-6.57)
3月	-0.144***	(-7.89)
4月	-0.0253	(-1.56)
5月	-0.0251	(-1.37)
6月	-0.0472**	(-2.47)
7月	-0.0263	(-1.51)
8月	-0.0393**	(-2.18)
9月	-0.0408**	(-2.26)
10月	-0.116***	(-6.59)
11月	-0.135***	(-8.17)
12月	-0.181***	(-11.22)
常数	0.0762***	(5.97)
R <sup>2</sup>	0.545	
F	31.65	
观测值	333	

注:1.文中贸易顺差计算公式:  $td_{usa} = \log(\text{imports})_{usa} - \log(\text{exports})_{usa}$ ,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与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之差为中美贸易顺差;2.D.td表示td一阶差分,即在公式(1)中的  $\Delta td$ ;3.上表中 L(1)即“L”为滞后一期变量,L(2)为滞后二期变量;4.\*、\*\*、\*\*\*、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从中美贸易顺差方程推导出的中美贸易顺差

冲击(以下简称“TDS”)序列将会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出现在负面新闻传递函数模型中。为了完整性起见,同样也对 TDS 时间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验证其是否遵循一个平稳的过程。表 1 Panel B 即为 TDS 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结果,分别利用了 DF 检验和 ADF 检验两种测试方法。结果表明,就像负面新闻指数一样,TDS 序列确实遵循一个平稳的过程,DF 和增强 ADF 测试结果远低于 1%的临界值。

#### 四、负面新闻传输模型

为了验证中美贸易顺差的意外变化对涉华负面新闻的影响程度,证明这一动态关系,构建了负面新闻传递模型,该模型允许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时间路径受到中美贸易顺差冲击序列(即 TDS 序列)的影响。在采用这种模型时,假定 TDS 变量是外生的,认为负面新闻指数不能反过来有效影响 TDS 变量的变动。据推断,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假设。在现实中可以看出,美国对涉华负面新闻在没有美国政府颁布贸易政策的相互配合条件下,不可能直接

表 3 传输模型的回归

变量	OLS(1)	OLS(2)	OLS(3)	OLS(4)
L. bni_us		0.667***	0.591***	0.598***
		(15.88)	(10.61)	(10.93)
L2. bni_us			0.118***	0.104**
			(2.08)	(1.85)
L. bni_au	0.417***	0.114	0.0836	0.0839
	(3.82)	(1.37)	(0.99)	(1.04)
L2. bni_au	0.380***	0.139**	0.131*	0.139**
	(3.48)	(1.68)	(1.59)	(1.75)
L. TDS	0.0349	0.0164	0.0193	0.0189
	(0.83)	(0.52)	(0.62)	(0.61)
L2. TDS	0.0844***	0.0542**	0.0531**	0.0530**
	(2.01)	(1.73)	(1.70)	(1.71)
常数项	0.0325***	0.0173***	0.0166***	0.0107**
	(2.98)	(2.11)	(2.04)	(1.96)
月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无
Adjusted R-squared	0.285	0.602	0.606	0.612
F	9.761	32.21	30.89	87.62
观测值	331	331	331	331

注:1.文中贸易顺差计算公式:  $td_{usa} = \log(\text{imports})_{usa} - \log(\text{exports})_{usa}$ ,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与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之差为中美贸易顺差;2.上表中 L(1)即“L”为滞后一期变量,L(2)为滞后二期变量;3.\*、\*\*、\*\*\*、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对中美贸易顺差冲击(TDS 变量)产生多大影响。此外,为了在模型中引入稳健性检验,加入第三个国家——澳大利亚境内涉华负面新闻作为传递模型的一个控制变量。据此,采用的传递函数模型如下:

$$bni\_us_t = \alpha_0 + \sum_{i=1}^n \alpha_i bni\_us_{t-i} + \sum_{i=1}^n \beta_i bni\_au_{t-i} + \sum_{j=1}^n \phi_j tds_{t-j} + \eta_t \quad (3)$$

其中,  $bni\_us_t$  表示在  $t$  时期美国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bni\_au_{t-i}$  表示澳大利亚在时间  $t-i$  时期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而  $tds_{t-j}$  表示在  $t-j$  时期的“中美贸易顺差冲击”;  $\alpha_i$  表示因变量的自回归分量,  $\beta_i$  表示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负面新闻的报道系数, 而  $\phi_j$  则表示传递函数的参数, 模型中包含的滞后阶数由  $n$  表示。根据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和汉南-奎因信息准则(Hannan-Quinn), 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2, 而为了在估计过程中保持效率, 采用了最简单的模型形式。

表 3 给出了包含不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这是为了检验贸易顺差冲击(TDS)对负面新闻指数( $bni\_us$ )的稳健性, 但无论使用何种方式进行回归, TDS 变量对  $bni\_us$  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虽然在回归方程(3)中 TDS 第一期的滞后效应对  $bni\_us$  没有显著统计影响, 但在滞后 2 期后影响是显著的。估计的系数约为 0.05, 在标准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样本期间, 平均负面新闻指数为 0.12, 而白化(whitening)贸易顺差序列的标准差约为 0.15。由此可见, 对贸易顺差序列的一个标准偏差冲击导致了涉华负面新闻比例增加了 6.3%。

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基本上与表 3 所示的回归结果相似, 即 TDS 发生的第二个月开始对  $bni\_us$  产生影响, 大约 3 个月对  $bni\_us$  的影响达到最大值, 此时美国境内的涉华负面新闻指数大约上升到 0.05 以上, 随后影响开始逐渐消失, 全程持续时长约为 20 个月以上。因此, TDS 似乎是一个涉华负面新闻的先验指标。

#### 五、正向和逆向冲击影响的对称性检验

以上检验过后, 如果逆向贸易顺差冲击会引起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指数上升, 即涉华负面新闻文章数量增加。那么是否正向的贸易顺差冲击就会有效促使美国涉华负面新闻的数量减少, 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bni\_us$ )也会以相应的比例降低? 直觉上可能认为贸易顺差的意外扩大可能会导致  $bni\_us$

指数值的上升(即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数量增加), 但贸易顺差的意外缩小可能并不一定会导致  $bni\_us$  指数值的对称下降。如果两者存在不对称性, 那么表 3 的回归结果中,  $bni\_us$  既包括正面的 TDS, 又包括负面的 TDS, 就可能掩盖了正面和负面 TDS 的两种不同现象, 这两者间可能存在重要的差异。为了检验不对称性, 遵循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冲击是否会对产出产生不对称的影响(Cover, 1992)。这一过程需要从现有的 TDS 变量中分离出两个新的变量: 一个正向中美贸易顺差冲击(设定为“ZTDS”), 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意外扩大; 另一个是逆向中美贸易顺差冲击(设定为“fTDS”),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意外缩小。在进行变量分离时, 将 TDS 时间序列中指数值大于 0 的所有项筛选出来, 并将所有指数值小于 0 的项赋值为 0, 经过处理过后的序列命名为正向中美贸易顺差冲击(ZTDS)时间序列; 同理, 在负向中美贸易顺差冲击(fTDS)时间序列中, 留下指数值小于 0 的所有项, 并将指数值大于 0 的项赋值为 0。两个新变量 ZTDS 和 fTDS 将会在模型(3)中替换 TDS, 并分别进行验证。

表 4 报告了方程(3)的回归结果, 其中 TDS 变量被两个新创建的变量 ZTDS 和 fTDS 所分别取代。对比可以发现不同方向变化的贸易顺差冲击对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影响完全不一样。显然, 他们中存在着不对称现象。例如正向贸易顺差冲击(ZTDS)在滞后一期后就开始高度显著, 且系数值比在表 3 中 TDS 变量的系数大近 4 倍。而负向贸易冲击(fTDS)则完全相反, 滞后一期和二期都不显著, 这说明滞后两期以内的负向贸易冲击(fTDS)与涉华负面新闻指数( $bni\_us$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经济意义。进一步分析发现, 表 4 中回归 1 显示, 滞后一期的 ZTDS 的系数为 0.284, 而滞后一期的 fTDS 的系数为 -0.0573; 再根据滞后一期的回归 2 到 4 中两者的系数也不对称(0.262 与 -0.114, 0.214 与 -0.115, 0.233 与 -0.159); 同样从滞后二期表 4 中的回归 1 到回归 4 进行比较(0.502 与 -0.103, 0.238 与 -0.074, 0.218 与 -0.067, 0.209 与 -0.07)也可以发现, 正向的贸易顺差冲击(ZTDS)会在滞后一个月之后导致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急剧上升; 然而, 负向的贸易顺差冲击(即贸易顺差意外收缩)并不一定会以相

应程度降低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指数的比值。

因此,在中美贸易顺差冲击序列(TDS)中,只有正向贸易顺差冲击(ZTDS)才会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产生影响,滞后两期以内的逆向贸易顺差冲击(FTDS)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的影响不显著。两个方向的贸易顺差冲击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的影响不对称。

表 4 对称性检验(ZTDS)

变量	OLS(1)	OLS(2)	OLS(3)	OLS(4)
L. bni		0.612*** (7.49)	0.422*** (3.96)	0.477*** (4.24)
L2. bni			0.300*** (2.63)	0.260*** (2.22)
L. bni_as	0.454** (1.98)	0.482*** (2.83)	0.342** (1.99)	0.481*** (2.59)
L2. bni_as	0.450*** (2.07)	-0.0433 (-0.25)	-0.0141 (-0.08)	-0.223 (-1.27)
L. ZTDS	0.284*** (2.60)	0.262*** (3.24)	0.214*** (2.68)	0.233*** (2.72)
L2. ZTDS	0.502*** (4.00)	0.238*** (2.39)	0.218*** (2.27)	0.209** (1.69)
L. FTDS	-0.0573 (-0.34)	-0.114 (-0.94)	-0.115 (-0.94)	-0.159 (-1.45)
L2. FTDS	-0.103 (-0.91)	-0.0743 (-0.76)	-0.0670 (-0.67)	-0.0703 (-0.75)
常数项	-0.0133 (-0.76)	-0.0192* (-1.48)	-0.0143 (-1.14)	-0.00826 (-0.74)
月度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无
Adjusted R-squared	0.531	0.741	0.762	0.695
F	7.261	15.83	16.63	32.51
观测值	331	331	331	331

注:1.文中贸易顺差计算公式: $td_{usa} = \log(\text{imports})_{usa} - \log(\text{exports})_{usa}$ ,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与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之差为中美贸易顺差;2.上表中L(1)即“L”为滞后一期变量,L(2)为滞后二期变量;3.\*、\*\*、\*\*\*、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 六、论点的合理性说明

部分学者可能还会对中美贸易顺差冲击与涉华负面新闻之间的联系持怀疑态度,认为也许以上数据的证明结果仅仅是巧合使然呢?即使在前两个部分中进行的统计分析不能完全排除巧合的可能性,但在统计意义的允许范围内,第二类错误(在事

实上没有关联的情况下,保留一个非关联的零假设)的几率相当小。因此,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机制能够解释中美贸易顺差冲击与涉华负面新闻之间的联系。

#### (一)推理的合理性

其一,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随着中国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国会议员因此对中国提出的抗议和担忧不断叠加,中美贸易顺差成为美国的“心头之痛”。美国的国会议员、学者大肆传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诸如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各种不利影响以及公共卫生恶化(Autor,2016;McManus & Schaur,2016)。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是导致美国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降低进口竞争制造业的本地劳动力工资的主要原因(Autor,2013;Acemoglu,2016;Pierce & Schott,2016)。事实上,美国精英人士的想法与言论可以有效引导公众对某些中国事件的关注以及怎么看待中国。

其二,美国竞选总喜欢拿中国“说事儿”,也是国会议员拉取选票的惯例。当美国经济颓势毫无良方时,美国两党就会不约而同地转向负面指责与推卸责任,此时的中国往往就会成为其“替罪羊”(任娜,2012)。这种逻辑滑稽的竞选攻击,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绝非独例。关于涉华负面新闻成为美国竞选的关键“桥段”,也成为两党相互攻击的党争竞选工具,不但是候选人清晰传达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选民判断投票趋向的关键依据。两方无需辩解,只需简单炮制、猛烈攻击即可在选票数量上产生显著效果。

其三,当媒体发现,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更有吸引力时,媒体就会迎合读者的兴趣,扩大对中国负面新闻的报道覆盖面。因为发布关于中国负面新闻,会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收入(Stormberg,2015)。

#### (二)滞后期的合理性

很明显,这种机制的发生需要一个周期,即涉华负面新闻是由贸易顺差冲击引发的,这种机制不可能即时生效。因为学者和国会议员关于中美贸易问题的游说,除了需要钱,还需要时间,在贸易顺差冲击和随后的抨击增长之间,必然存在滞后期。因此,在这一机制运作的情况下,文中估计的2到3个月的滞后性比较合理。

## 七、结论

笔者构建了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来衡量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的变化。使用该指数(bni\_us)与中美贸易顺差冲击(TDS)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顺差的意外变化,在2到3个月后,涉华负面新闻指数会急剧上升。其中,在中美贸易顺差冲击序列(TDS)中,只有正向贸易顺差冲击(ZTDS)才会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产生影响,逆向贸易顺差冲击(FTDS)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的影响不显著,两个方向的贸易顺差冲击对涉华负面新闻指数(bni\_us)的影响不对称。

此外,研究发现这种效应的大小不仅稳健,而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经济上也具有显著意义:一个标准偏差单位的中美贸易顺差冲击,导致了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在2到3个月后指数增加了6.3%。因此,这一结果为涉华负面新闻因何而起提供了经验支持,即关于美国境内涉华负面新闻的增加可能是由中美贸易顺差的意外扩大所引起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Acemoglu D , Autor D , Dorn D , et al.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S1):141-198.
- [2]Arcuri, Luciano, et al. Predicting the Vote: Implicit Attitudes as Predictors of the Future Behavior of Decided and Undecided Voter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8 (3): 369-387.
- [3]Cover J P . Asymmetric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ney-Supply Shock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4):1261-1282.
- [4]Enders, Walter. Applied Economic Time Series[J]. Technometrics, 1995(4): 469-470.
- [5]Mcmanus T C, Schaur G .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Worker Heal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102):160-172.

- [6]Milyo J, Groseclose T.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J]. Working Papers, 2005(4): 1191-1237.
- [7]Ramirez C D, Rong R . China Bashing: Does Trade Drive the 'Bad' News About China in the U.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2):350-363.
- [8]Ramirez C D. The Effect of 'China Bashing'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2(3):291-311.
- [9]Stromberg, D. Media and Politics [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5(7): 173-205.
- [10]冯文权. 传递函数模型与干预分析模型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89(12): 47-53.
- [11]卢锋, 殷剑峰, 钟伟, 汪涛, 黄海洲, 邢自强, 朱海斌, 崔历, 刘元春, 鲁政委, 陈兴动, 伍戈, 洪灏, 程实, 张斌, 张明. 动荡中的分化: 美国与中国经济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1): 42-86.
- [12]谭融.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案例研究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4): 63-66.
- [13] 堂前钦司, 杜宏. 从最惠国待遇看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J]. 国际观察, 2002(2): 21-25.
- [14]屠新泉. 中国加入 WTO 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11): 30-36.
- [15]吴浩, 曹庭泉, 花向红, 邹进贵, 史文中, 卢楠. GNSS 时间序列中随机漫步消噪的改进半软阈值算法及其评估 [J]. 测绘学报, 2016(S2): 22-30.
- [16]吴心伯. 论亚太大变局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6): 32-59.
- [17]朱锋. 人权问题和中美关系: 变化与挑战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7): 19-24.
- [18]庄子银, 李宏武. 贸易、知识产权与出口企业创新: 基于美国 337 调查的实证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4): 75-87.

# Research on Imbalance in Sino-US Trad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related Negative News

MENG Li-jun<sup>1</sup> LI Gang<sup>2</sup>

(1.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Sino-US relation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orld concern as well, but the US media emotion reflected the standpoint of US governmental, social and people o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ased on the China-related negative news data in America and Sino-US bilateral trade data from 1990.1 to 2017.1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 two issu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fter two to three months of TDS in America, the number of China-related negative news in America sharply increased, and it has reached up to the maximum till the third month 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s. It reveals that the severe rising of China-related negative news in American might be the inner factor of Sino-US lateral trade fluctuation.

**【Keywords】**surplus of Sino-US trade China-related negative news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